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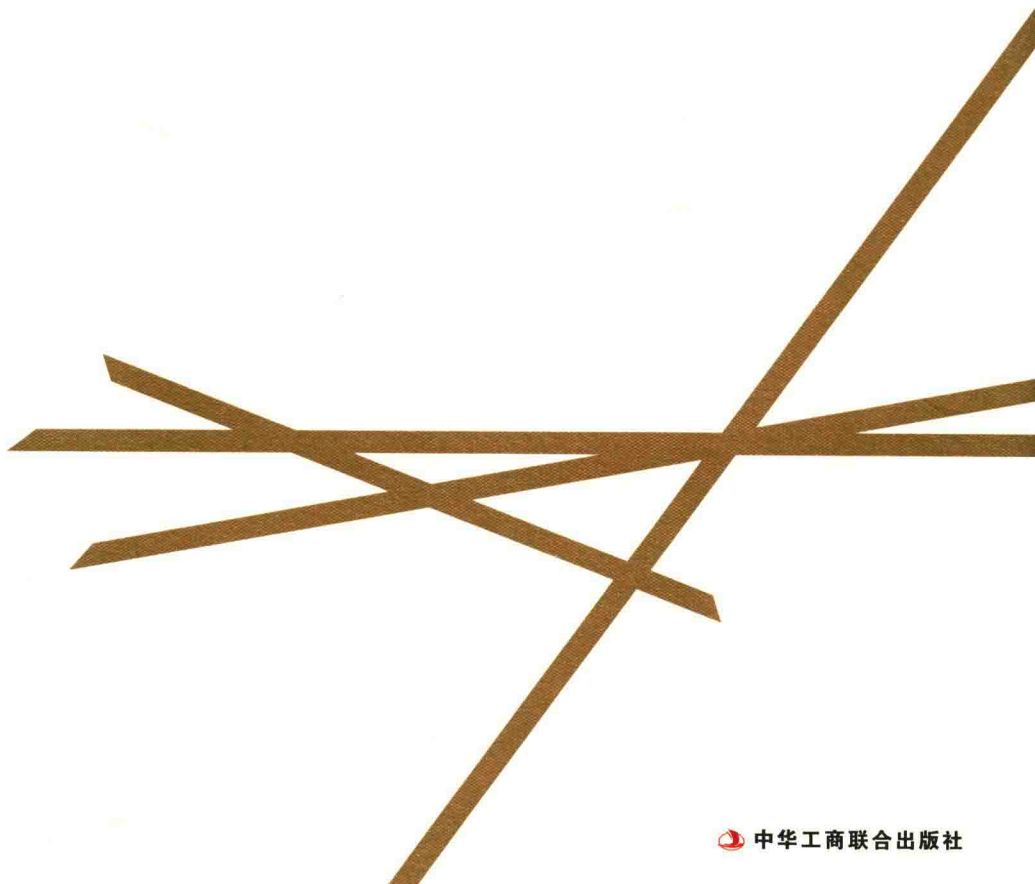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成果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I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 产生和形成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 Bourgeoisie

虞和平 ■ 著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成果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I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 产生和形成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 Bourgeoisie

虞和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虞和平著.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5. 12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1)

ISBN 978-7-5158-1524-4

I. ①中… II. ①虞… III. ①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9612 号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I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

作 者: 虞和平

出 品 人: 徐 潜

策 划: 王宝平 魏鸿鸣

责任编辑: 魏鸿鸣

装帧设计: 周 源

营销总监: 曹 庆 郑 奕

营销推广: 王 静 万春生

责任审读: 郭敬梅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9.25

书 号: ISBN 978-7-5158-1524-4

定 价: 59.0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l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序 言

一、已有的研究状况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其内涵是指资产阶级的本体，即近代商人或资本家的群体，不包括有的学者所附会的资产阶级党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群。资产阶级无疑是中国近代的新兴阶级和主体阶级之一，也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化身，在它的身上包涵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化的发展程度，也铭刻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轨迹。对它在中国近代所处的状况，及其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所做的努力和所产生的作用、所经历的遭遇进行全面的考察，总结其发展经历、成长程度、正反作用、成败得失的基本状况、特点和经验教训，既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状况和性质；也有助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这一课题是国内学者已有较多评论和研究而又有较多分歧和疑问的课题。早在民国中晚期就有一些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政论性论著出现，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为明确革命对象而作，并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观点。如：1923年瞿秋白发表的《论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二文^①，陈独秀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二文，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他们不仅提出了资产阶级这一概

^①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110页；第193—226页。

念，而且划分了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或归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或归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或归中产阶级），指出三者不同的经济背景和政治属性，但是对买办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并非一概否定。如瞿秋白还论述了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认为“买办阶级之中亦发生阶级分化，一部分大买办逐渐工业化，逐渐增加其‘独立性’”，因而“买办阶级之中会生出民族资产阶级来”^①。陈独秀则将“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划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将以“小工商业家”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划为“中立的”“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只是将“官僚资产阶级”划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②；他还认为“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③。毛泽东在后来又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多次评论过资产阶级两个部分——买办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区别，并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一度把大资产阶级归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在抗战结束前后，又将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到解放战争时期即称“官僚资产阶级”，并等同于“大资产阶级”^④）和自由资产阶级（即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陈伯达在1942年发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⑤一文，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说明了大、中、小资产阶级的人员组成成分和政治态度。许涤新在1947年写了《官僚资本论》^⑥一书，内中亦谈及了官僚资产阶级，并列举了盛宣怀、张季直、交通系的梁士诒与叶恭绰、国民党的五大财团。这些著作的政论性很强，论述的主要是各类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

① 瞿秋白：《论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87—110页。

②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③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④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3页。

⑤ 《解放日报》，1942年2月4、5、7、8、9日连载。

⑥ 海燕书店，1947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性研究逐渐展开。从研究的成果来看，除了有较多的论文发表之外，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其中较有综合性研究意义的著作，主要有：1980年之前出版的，李青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道路》^①，冯定著《有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问题》^②；1981—2000年出版的，黄逸峰、姜铎编著《旧中国的买办阶级》^③，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④，朱英著《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⑤，马敏著《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⑥，吴序光主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命运》^⑦，章开沅等编《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1860—1919》^⑧。2001年之后出版的，朱英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⑨，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⑩。此外，还有不少专题性、地区性，以及商帮、商会研究的著作。

从已有的成果来看，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十个方面：（1）关于资产阶级的来源，从资本主义性工商、金融企业投资创办者的原有身份予以考察，所涉者包括传统商人、早期买办、官僚、地主、绅士、手工业主、科技人员、归国华侨等。（2）关于资产阶级的类别构成，或从其出身和政治属性出发，把他们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或从其经营行业出发，把他们分为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或从其所拥有资本的大小和政治属性出发，把他们分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并以此原则，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3）关于资产阶级的数量，以全国商会会董数量为依据，对清末的资产阶级数量有过几种估计。（4）关于资

① 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

②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④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⑩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产阶级的形成，或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出发，或从资产阶级数量出发，或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活动出发，或从资产阶级性党派产生出发，进行论述，提出了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1895年前后形成说、戊戌形成说、辛亥形成说。(5)关于资产阶级的组织状况和社会地位，近年来较多从商会、会馆公所、同业公会、商民协会等商人团体进行研究，尤以商会研究为多，认为商会的产生和发展使资产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地位得到明显提高。(6)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态度，主要是在研究戊戌维新、晚清反美爱国运动、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民初反袁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四一二政变等政治运动中论及；并认为资产阶级的态度是被动的、软弱的、摇摆的，正面作用是很小的。(7)关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早期的研究认为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在政治上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集团，并为之服务，在经济上有碍于民族资本的发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代表，因而也是反动的；其他资产阶级，则因其力量有限，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缓慢地发展，因而不仅作用有限，而且亦带有程度不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则较多地注意到了各种资产阶级在实业救国和振兴实业中的积极作用。(8)关于资产阶级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的关系，从资产阶级对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等各方面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进行研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主干载体的地位和作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因受到国内外环境及自身条件的限制，难以承担起应有的历史使命。(9)关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已不同程度地探讨了资产阶级团体和人物的民族主义、实业救国、资本主义民主的主张和思想。(10)关于资产阶级的单个人物，已涉及众多人物，其中研究较多的有郑观应、唐廷枢、盛宣怀、张謇、虞洽卿、刘鸿生、范旭东、荣氏兄弟、穆藕初、周学熙、卢作孚等人。

此外，台湾地区学者也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作过一些研究。就近20年的研究成果而言，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于：清末民初的上海总商会、苏州会馆公所和商会，以及资产阶级与清末民初政府、资产阶级

与城市建设、资产阶级与政府经济管理、资产阶级与经济民族主义运动、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运动等。在研究空间上主要集中于上海和江苏地区^①。

中国学者的这些已有研究，从视角、内容和评判上来看，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在1980年之前的第一阶段中，基本依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进行研究，研究视角较多从传统政治概念和政治斗争出发，对资产阶级的种类构成、政治立场和属性、经济和社会作用进行评论。研究的重点是揭示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研究时间集中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尤其集中于五四运动以前。研究范围主要着眼于资产阶级的来源和种类划分、政治性质及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研究结论以否定性评判为主调，尤其是对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几乎所有研究都持全盘否定的观点。在1980年以后的第二阶段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对资产阶级政治属性的研究逐渐淡化，而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研究逐渐增加。研究角度开拓到早期现代化、市民社会、社会与国家的概念。研究时间扩展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并开始向战时和战后延伸。研究范围深入到组织形态变迁、政治参与、经济思想、商人外交、文化教育、社会慈善等领域。研究结论趋向多元化和客观化，力求实事求是地考察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除了继续深化分析各类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弱点之外，较多地探讨了资产阶级组织的发展和活动状态，及其在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具体贡献和促进作用。同时，在名称的使用上，亦从资产阶级概念向商人概念转换，特别是2000年以后，这种转换几成一统，用资产阶级概念的日见减少。

外国学者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先行于中国学者。如日本学者，早在1929年由东亚印刷株式会社大连支社出版了志村悦郎的《浙江财阀》一书，研究了在上海的“江浙资产阶级”的状况、成为财阀的

^① 主要研究成果有：邱彭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0年版；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版；赵祐志：《日据时期台湾商工会的发展（1895—1937）》，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另有李达嘉研究近代商人的多篇论文。

缘由，及其与北伐战争和蒋介石的关系。1932年日本《中央公论》第六号，发表了《中国资产阶级分析》一文，由国民党人雷啸岑译成中文在中国刊出，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经济背景，并重点分析了浙江系的构成情况^①。1938年东京日本评论社又出版了山上金男的《浙江财阀论》一书，对江浙资产阶级及其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美国学者，斯潘塞（Frederick Speneer）在1934年发表《蒋介石的独裁错误》一文，研究了资产阶级与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关系。鲍华伦（Robert W. Barnett）在1941年出版《上海经济——政治的抵押品，1937—1941》一书，研究了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支持^②。

1949年以后，外国学者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有较大拓展。他们的研究成果除了众多的相关论文之外，也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1）关于买办资产阶级。对此研究较多的是美国学者郝延平，他于1970年出版了《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一书，研究了买办的产生、职业、经济地位和作用，以及买办制度，认为买办是沟通中外经济关系的桥梁，并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③。（2）关于资产阶级与政府和地方政治的关系。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有美国学者小科布尔，他于1980年出版了《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一书，着重研究了以江浙财阀集团为核心的上海资本家阶级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合作和矛盾冲突关系，认为江浙财阀一方面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了国民党政府，他们的某些代表人物成为国民党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④。（3）关于资本家阶级的自我发展和政治参与状况。对此进行较多

① 雷啸岑译：《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时事月报》，第7卷，第1期（1932年7月、8月），专文，第23—28页；第2期（1932年8月），专文，第81—85页。

② 参见〔美〕小柯布尔著，杨希孟、武莲珍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

③ 参见〔美〕郝延平著，李荣昌、沈祖炜、杜恂诚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

④ 参见〔美〕小柯布尔著，杨希孟、武莲珍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研究的是法国学者白吉尔，她于1985年出版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一书，着重讨论了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及其参与社会政治运动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状况及作用。她的主要观点：一是认为资本家阶级不是辛亥革命等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运动的主要力量，并以此认证辛亥革命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二是认为袁世凯垮台以后，随着政府经济和政治控制力量的削弱，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条件，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政治独立性也明显增强，从而出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并试图建立自己的政府，但最终归于失败，转而依附于国民党^①。（4）关于资产阶级组织状况及其作用。如美国学者博士博对上海商人组织的研究，他于1985年出版专著，从上海商人组织与政党和国家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上海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状况，着重考察了1890—1930年间，以商会为中心的上海资本家团体与上海地方政治和城市管理的关系及其所处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认为资本家阶级是上海政治运动和城市管理中的精英群体^②。又如美国学者陈忠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他于2011年出版专著，对晚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商会与社会变迁进行了研究，探讨了通过各地商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的状况，及其所展开的活动对该地区社会变化所发挥的作用，颇有创新意义^③。

外国学者对中国近代中产阶级的研究，既有与中国相同之处亦有自己的特色。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他们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构成、类别划分及其政治属性和表现有较多的研究，尤以苏联学者为多。此后，他们的研究有明显开拓，除了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类别划分提出否定性的不同观点，对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正

① 参见〔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巴黎，弗拉马里翁，1985年）。

②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③ Zhongping Chen, *Modern China's network revolutio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面性评论之外^①，也与中国学者的后期研究渐趋接近。他们的研究视角，大多采用现代化、社会与国家的概念。他们所研究的内容，较多地倾向于资本家阶级的能量及其与政府和地方社会的关系，分析其所处角色、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也比较重视会馆、公所、商会等资产阶级团体组织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1937年之前，特别是1890—1937年这一时期。

上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相对较少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及其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整体性研究。虽有少数研究成果涉及整体性研究，但或注重某一方面，或限于某一时段，或在评判上有失偏颇，或在视野上不够全面，且内容比较单薄。

二、关于“资产阶级”概念的问题

由于在早期的资产阶级研究中，对资产阶级的概念有一种说法，即资产阶级包括了资产阶级党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群，因而被有些学者指陈为界限不明，难以研究，且不能反映资产阶级本体——资本家或商人的真相。但大多数有关研究者则认为，把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党派和知识分子在内的说法，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广义概念，也只是极少数学者以此进行研究；一般所谓的资产阶级只是指资产阶级的本体，大多数有关学者所进行的资产阶级研究的也只限于此。于是，为了表达上的清晰起见，有些专门研究资产阶级本体的学者采用了资本家阶级或商人的称谓，以代替资产阶级的称谓；后来，又从避免阶级斗争的概念、资产阶级是反动阶级的成见出发，使用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称谓者渐趋减少，而使用商人称谓者逐渐增多。

近年来，用商人称谓进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达到了极致的程度，这就是冯筱才所明确提出的完全以商人概念取代资产阶级概念。他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四点：

^① 外国学者相关研究的总体状况参见：张仲礼等：《国外有关中国资产阶级研究概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潘君祥：《苏联学者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部分材料》，《上海经济研究》，1983年，第8期；杨立强等：《近年来国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 中国近代没有资产阶级。他说：“所谓‘阶级’，最起码要存在稳定的基于经济利益的群体认同或者‘阶级自觉性’、‘阶级集体行动’等。依据笔者对近世商人的观察，至今仍未发现这些‘自觉性’与‘阶级集体行动’有多少实际存在的证据。”“‘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我认为只有在讨论国民党及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或者商人政策时，或者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言论时，方可使用，这是历史事实。而此时‘资产阶级’这一名词并不是指工商界人物本身，而是党人或文人口中的一种“想象出来的形象”^①。

2. 使用资产阶级概念就会有预设和先入为主的立场。他指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放弃预设立场，或者避免使用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如‘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从商人所经历的事实本身出发去作适度的分析呢？”^② 学界“讨论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③。

3. 资产阶级概念的内涵界限不清。他认为：“‘资产阶级’一词，由于其概念范围甚广，把党人、军人甚至学生等政治志趣相距甚远的群体均包括其中，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词语最不适合用作分析商人的概念。”^④ “如果要对近世中国商人的经历切实地进行考察，我认为研究者便必须先挑出‘资产阶级’的概念体系”^⑤。

4. 资产阶级是商人们不承认的一个概念，而“商人”则是商人们自己认同的一个概念，是社会上惯用的称呼。他认为：“商人从来都不大称自己为‘资产阶级’。如果我们在使用一个概念的同时，被指代的对象自身都不承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概念，而不使用他们自

①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同上书，第8页。

④ 同上书，第8页。

⑤ 同上书，第314页。

已认同的概念。”^①“讨论某一历史主体最好直接使用社会上惯用的称呼，或者他们自己所使用的名词，最好不要使用带有褒贬色彩或者意识形态成分较浓的词语。”^②

冯筱才所提出的上述理由，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所在，有助于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近代商人或资产阶级。如果将商人概念与资产阶级概念共存，共同作为商人或资产阶级研究的概念，将商人作为资产阶级的本体进行研究，不仅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是多有益处的，但是将商人概念作为唯一的概念，并完全取消资产阶级概念则颇有疑问。

首先，中国近代是否真的没有资产阶级？上述第一点中所言的，作为阶级存在标准的，“基于经济利益的群体认同或者‘阶级自觉性’、‘阶级集体行动’”，是否完全不存在于中国近代商人身上。在已有的关于商会等商人团体的研究中，应该说不乏这方面的论述。即便可以说商会等商人团体的主张和行动大多没有直接征求全体商人的意见，只是由商会领导层，甚或个别领导者提出和发动的，但也不可否认经过了一定的民主程序，并大多获得一般商人们的响应和支持，理应可以作为一个阶级的集体觉悟和行动；至于确为个别领导人所言所为，且得不到一般商人响应甚至反对者，实属寥寥无几。这种由领导阶层通过民主程序做出决定并代表本阶级发表主张、组织活动的方式，亦为国内外任何阶级所共有；而那种由全体一般成员自发联合起来发表主张、采取行动的现象是极为少见的。即便可以说中国近代商人没有达到形成一个阶级，即自觉自为的资产阶级的标准，那么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群体，即自在的资产阶级是否存在？（关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自在状态和自为状态本书将有专章论述。）

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是否是中国人臆造来的？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是从国外引进的，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而传入的，但亦是西方近代时期的产物和研究近代历史的普遍用语，应该说是符合西方近代社会事实的。外国学者不仅用资产阶级概念研究他们本国的近代史和近代

^①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第316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商人，而且也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和近代商人，上述所谈及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几乎都使用了资产阶级概念。如果说在 1949 年后外国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有受中国学者影响的因素，那么在 1949 年之前他们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应该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时的中国学者尚少使用这一概念，而外国学者已不乏使用。如 1929 年出版的日本学者志村悦郎著《浙江财阀》一书，就使用了资产阶级的概念，该书的《前言》指出：所谓浙江财阀，主要是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江浙两省出身的金融业者及其实业家的概称，或叫做上海财阀或“江浙资产阶级”，也是与国民政府结成密切利害关系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主体。1938 年出版的山上金男著《浙江财阀论》一书，作者在书中说：浙江财阀“是在上海以浙江出身者为中心的新兴资产阶级基于地方主义的团结意识而构成的地缘集团。”^①又如美国学者斯潘塞在 1934 年发表的论文中评论说：“改组后的国民党系建立在上海银行家、城市工商资产阶级及农村地主阶级等新的社会基础上”。鲍华伦在 1941 年出版的一书说：1927 年后，“一个进取的但又是反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给予执政的国民党以主要的鼓励和支持”^②。由此而言，资产阶级已是世界近代史中的一个通用概念，难道就唯独不能用在近代中国和中国近代商人身上。当然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及其词汇概念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及其词汇概念，这个不同之处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资产阶级研究需要重视和揭示之处，但以此否定中国近代有资产阶级存在，进而否定以资产阶级概念对它的本体——商人进行学术研究，这是需要谨慎斟酌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近代中国真的没有资产阶级，而只有分散的一个一个的商人，那么将有一系列的中国近代史问题需要重新解释，整个近代史的体系结构亦需要重新构建。如：资产阶级是否是中国近代的新兴阶级，如果没有资产阶级而只有商人，那么是否可以说商人是新兴阶

① 山上金男：《浙江财阀论》，日本评论社（东京），1939 年版，第 71—72 页。

② 转引自 [美] 小科布尔著，杨希孟、武莲珍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 2 页。

级？又如：是否存在工人阶级，如果有，那么是否可以存在没有以资产阶级为对应的工人阶级；再如：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有，那么是否可以存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如果没有，那么近代新式企业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经济？此种疑惑可谓是不一而足。因此，断言中国近代没有资产阶级，未免缺少全局思考，亦过于武断。

其次，以往使用资产阶级概念中存在不妥之处，是否就必须废除这一概念？上述第二、三点中所指的使用资产阶级概念的不妥之处，在以往的资产阶级或商人研究中，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注意和避免“预设”和“先入为主”意识，分清资产阶级的概念内涵，自然有助于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研究商人或资产阶级。但是，其中将划分资产阶级为不同等级和类型，一概视为是“预设”和“先入为主”，未免言过其实。实际上，对资产阶级的等级和类型划分是依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和职业身份而做出的，其中划分是否恰当的问题，则另当别论。至于将资产阶级及其不同等级和类型者机械地一概与一定的政治立场直接挂钩，当然是一种“预设”或“先入为主”。

所谓对资产阶级及其不同等级和类型者政治立场的“预设”和“先入为主”，其实是一种多年来形成的成见。这种成见，一说到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就认定其为反动阶级；一说到中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认定其有“反动性”的一面和“软弱性”的本质。这种论说，产生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从革命的角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而提出的，它具有明确革命对象、划分革命阵营、进行革命动员的意义，也是一种时代的需要，并且是就资产阶级及其不同等级和类型者整体状况而言的，并非指其中的所有单个分子。在对资产阶级进行学术研究上，当然不能简单套用这种论说，尤其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全面性研究上，如经济史、教育史、慈善史、现代化史的研究上，更不能简单套用这一论说。在早期的有关研究中，由于主要是从革命史的角度，或从资产阶级概论的角度出发，因而套用这种论说的现象较多，甚至将其从资产阶级整体属性研究延伸到单个分子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片面性的成见。这种成见，在对资产阶级进行学术研究中当然是需要避免和纠正的，也正是需要进一步实事求是研究的。

然而，这种由成见而带来的所谓“预设”和“先入为主”，以及僵化的“阶级分析”，不是通过简单地改用商人概念就能纠正的，因为对商人亦有自古带来的成见，也可以作阶级分析。就商人整体而言，自古以来就有所谓“无商不奸”、“市侩作风”、“市井小人”、“商人习气”等的贬义性成见。对此，冯筱才的著作也多有论述，他说：近代之前，“在士人眼里，商人获利的途径既不脱欺诞之术，对其角色的评价自然属于低贱之流。一般民众的观念中，商人自然不会有好名声。李陈顺妍的研究便显示，认为商人奸诈成性，好不劳而获，实是农业社会中的大众心声”^①；到了晚清，“人们完全可以一边利用商人的劳动丰富生活，一边仍骂着‘无商不奸’。”^②“1910年4月，有人撰文指出对商人的评价至‘晚近之世，愈趋愈下，轻之曰经济中人，贱之曰市侩，斥之曰奸商’，商人‘遭举世之白眼，受举世之诟病’。实际上直至19世纪40年代，仍有所谓‘罪在商人论’，将一切经济秩序的扰乱归咎于‘奸商’的破坏。”^③此外，以商人为研究概念，是否就可以将所有商人一锅煮，不需要对其做分层、分类研究，如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人；买办商人、钱业商人、贸易商人、工业商人等？如果仍需划分，那么对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商人亦存在着雷同于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的评判。

第三，资产阶级概念的内涵界限是否不清？是否不可以指代商人？上文已经谈及，资产阶级概念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资产阶级的狭义概念，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本体，具体而言是指资本家阶级或近代商人群体，这是大多数进行资产阶级专题研究者所采取的概念涵义，其界限应该说是清晰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广义概念，实质上是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下对其本体概念的外延，其所延伸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或为资产阶级服务、属于资产阶级阵营等。由于中国近代已开始逐渐扩展的资本主义化，资产阶级的这一

①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②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第39—40页。

③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第41页。

外延自然会涉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和各类人群，如政党、革命、政府；文化、思想、教育；知识分子、军人等等，虽然其界限不很清楚，但也不无道理，不悖史实。这种狭义概念与广义概念的关系及其运用，对中国近代历史及其研究而言，不只是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也存在于其他的概念之中，如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就有狭义上指资本主义经济，而广义上延及的“资本主义性”则涉及各个方面，其广泛性不亚于资产阶级。与此类似的，还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等概念。如果将此类概念都排除在中国近代史及其研究之外，可能也就不能成其为中国近代史了。如果以商人概念取代资产阶级概念，那么其概念外延的使用是不可完全取代的，必将带来相关事物的概念混乱。

所谓狭义概念的资产阶级，其具体内涵是指具有现代性的商人或资本家。这种现代性的商人或资本家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产生发展的，是近代的“新兴阶级”。这种概念含义虽然在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的有关论述中未曾见及有完整的界定，但在字里行间是有所表达的。从最早提出资产阶级概念的几位中共领导人的论述中就有这种意思的表达，如瞿秋白说，“中国的宗法社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发 展”；在这一真正的“资产阶级之中”，有“大商阶级”、“海外侨商”、“小商人”、“新兴的工业阶级”^①。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随着宗法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也指出了“新兴”性。陈独秀则将“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划为“革命的资产阶级”^②。这无疑是说“新兴的工商业家”是资产阶级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毛泽东说，“大银行家、大商人、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并列举了陆宗輿、陈廉伯、唐绍仪、何东、张謇、盛恩颐诸人，这些人都是新兴资本主义银行和工商企业的参与者和创办者；在他说的“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中，把“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列在第一位，虽特别注明，“因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本

① 瞿秋白：《论中国资产阶级的发 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87、108页。

②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22期，1923年4月25日。